

目 录

路远《碑林语石》序·····	赵 超(1)
宋刻秦《峰山刻石》再读·····	(1)
西安碑林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17)
邓艾祠与前秦《邓太尉祠碑》·····	(30)
述后秦《吕他墓表》·····	(38)
《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辨·····	(45)
《集王圣教序碑》断于金末考·····	(53)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初刻的背景与时间·····	(64)
《皇甫诞碑》刻立时间及流迁经过·····	(76)
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碑》可靠性之辨析·····	(84)
褚遂良《孟法师碑》曾为碑林藏石考·····	(97)
张旭《草书千字文》断石新考·····	(102)
述西安碑林藏颜真卿书迹刻石七种·····	(114)
怀素书迹刻石三种考述·····	(152)
唐《尚书省郎官题名石柱》之初刻与改刻·····	(166)
李阳冰《三坟记碑》《捋先茔记碑》为唐刻原石考·····	(184)
《玄秘塔碑》与《迴元观钟楼铭》 ——述西安碑林藏柳公权书迹刻石·····	(195)
《唐净住寺释迦文贤劫像铭》略考·····	(209)
杜顺、华严寺与《杜顺和尚碑》·····	(215)
新见唐刻《佛遗教经》残石考·····	(223)

唐国学《五经壁本》考

——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235)

《景教碑》移藏西安碑林经过…………… (243)

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 (262)

北宋时期长安古碑的两次劫难…………… (285)

梦英事迹考述

——以碑林藏赠梦英诗刻石为线索…………… (289)

郭忠恕其人其书与《三体阴符经》刻石…………… (319)

《全宋诗》补遗十八首

——据西安碑林藏赠梦英诗刻石…………… (329)

宋刻智永《真草千字文》碑…………… (339)

宋金时期京兆孔庙七贤堂考…………… (351)

新出宋《京兆府学新建七贤堂记》残石…………… (355)

有关清代选官制度的重要资料

——读《保举题名》碑…………… (358)

西安碑林本清刻赵孟頫《天冠山诗》辨伪…………… (389)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412)

碑林藏董其昌书迹刻石三种…………… (420)

《黄庭坚诗帖》辨伪…………… (433)

刘墉《心画初机帖》…………… (438)

何绍基书《顾夔墓志》…………… (445)

西安碑林藏近代名人书迹刻石…………… (449)

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 (475)

后记…………… (501)

宋刻秦《峰山刻石》再读

宋刻秦《峰山刻石》，陈列在西安碑林的第五室。与陈列在第二室、第三室中那些观者趋之若鹜的汉唐名碑相比，它显得有些落寞。不过，在历代金石著作中，它却往往被当作“秦碑”而位居卷首。虽说宋人重刻的目的只是为了书法欣赏，可重刻对象本身的价值，远远高于书法欣赏之上。即便它只是宋刻而非原石，但它的背景在秦，它的故事在秦，它所反映的，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那场影响至深至远的伟大而剧烈的变革。

一、秦始皇的五次出巡与七处刻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朝，并登上了全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自上而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分封，建立郡县，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免，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由此拉开了序幕。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他为新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制定和推行了新的统一标准。为了扩张和巩固帝国的疆域，他筑长城，修驰道，移民实边。当然，还有“意识形态”领域，为了强化思想统治，他“焚书坑儒”，严刑苛法，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位始皇帝为了他的帝国，为了皇帝宝座子子孙孙世代传承，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然而，历史像是在跟这位政治强人开玩笑，他死后仅仅4年，其君臣苦心经营的帝国便二世而亡，土崩瓦解。所幸灭亡的只是秦王朝即嬴氏的“家天下”，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并未发生逆转，秦王朝奠定的统一的基础，也未随其一同消亡。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步步发展起来，直到今天。

从嬴政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开始，这位勤勉的始皇帝先后五次出巡，几乎马不停蹄，足迹踏遍当时大半国土，直到最后死在南巡会稽的归途中。他当然不是在游山玩水，出巡是巩固统一的政治行为。他不仅需要认识刚刚被征服的土地山川，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向陌生的六国遗民显示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的五次出巡中，留下了七处纪功刻石，他要把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昭示后代。另外，秦二世即位的当年，亦东行郡县，南至会稽，在始皇所立刻石上，又都加刻了自己的诏文。按《史记》所

载，秦始皇五次出巡和刻石的大致经过如下：

1. 公元前 220 年，巡陇西（秦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北地（秦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出鸡头山（在今宁夏隆德县），东归时过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这是秦始皇唯一一次出巡西北边地。

2. 公元前 219 年，东巡郡县，上邹峯山（在今山东邹县），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登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并渤海以东，过黄（即黄县，秦故城在今山东黄县东南）、脍（即脍县，在今山东福山县），穷成山（在今山东荣成县），登之罘山（在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上）；南登琅琊（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海畔），留三月，筑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西归时，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渡淮河，抵衡山，自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之纪南城）入武关回咸阳。此次出巡，刻立《峯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3. 公元前 218 年，再度东巡，至阳武（秦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遇刺受惊；再登之罘，立《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也在之罘）；归途中又至琅琊，取道上党（秦郡名，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县）回咸阳。

4. 公元前 215 年，东巡碣石（有说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仙台山），刻碣石门，即《碣石刻石》；继而巡北边，自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南归咸阳。

5. 公元前 210 年，南巡至云梦泽（即洞庭湖），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而下，过丹阳（秦县名，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北），至钱塘（秦县名，在今杭州市西），临浙江（即钱塘江）；上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立《会稽刻石》。返回时路过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从江乘县（在今江苏句容县北）渡长江，北至琅琊、荣成山、之罘山。当秦始皇行至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古黄河上）时，得重病，死于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①。

秦始皇总共只当了 11 年皇帝，不仅在全新的大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竟然还能在其中的 5 年里出巡五次，而且次次都是长途跋涉。值得注意的是，五次出巡中有三次都来到山东半岛的滨海地区。也许，生长于西部内陆的秦始皇，对海洋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向往和喜爱吧。但更可能的是，他的三幸海滨，是急切地希望在海中仙岛上找到长生不老之药。他第一次巡幸滨海，就在琅琊遇到了鼓吹“不死之药”的方士徐市（亦称徐福），于是耗费巨资，遣徐市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人海求仙。可是徐市一去不返。直到最后一次南巡会稽的归途中，他又第三次来到海滨的琅琊、之罘，也许还是念念不忘入海寻药的徐市吧。

秦始皇终于没有吃上“不死之药”，怀着遗憾病死在归途中。在自然法则面前，人的生命多么渺小，哪怕你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皇帝。同样，出巡中所刻的七处刻石，面对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也显得非常脆弱，原石尚存者仅《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两处，而且只剩几块可怜的残石。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二、秦刻石的存佚状况

1.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最初应立于泰山岳顶秦始皇封禅坛近旁。宋代金石家欧阳修、赵明诚等在其著作中都有著录^①。然而，对《泰山刻石》当时的保存状态、形制及刻辞文字的存佚情况，惟有宋人刘跂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刘跂字斯立，时称学易先生，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②。大观二年（1108年）和政和三年（1113年），他两次登泰山，宿绝顶，第二次还亲手工制作拓本。其《泰山秦篆谱序》记曰：

今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二世诏文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莫可复见。……余以大观二年春，从二三乡人登泰山，宿绝顶，首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广狭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砢。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摹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余审视之，隐隐若有字痕，刮摩垢蚀，试令摹以纸墨，渐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终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复宿岳上，亲以毡椎从事，校之他本，始为完善。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读者百四十有六。^③

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刘跂没有“惟凭工匠所说”，而是亲自去实地踏访，果然别有收获。按刘跂所记，《泰山刻石》是刻在“不加磨砢”即未经人工雕琢的、大致为方形的天然石块上，石高“不过四五尺”，四面刻字，因每面宽窄不一而行数不等。时人所见“所谓五十许字者”，是较为平整“人常所摹拓”的南面的刻辞，为二世诏书；始皇帝诏书刻在北、西、东三面，因“残缺蔽暗”而“人不措意”。刘跂“刮摩垢蚀”，“亲以毡椎从事”，所得“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读者百四十有六”。也就是说，刘跂所见所拓《泰山刻石》的文字，是四面刻辞，远多于当时流传的南面刻辞即“五十许字”的二世诏书。刘跂之后，董道也曾登泰山考察刻石，其《广川书跋》有云：“明年，余至泰山，就视其石，高才八九尺，方面二尺余，以乱石培其下。”^④其所记不及刘跂详实，刻石的形制亦有异。

从宋代开始，已有《泰山刻石》的重刻本。如庆历间宋庠（莒公）摹刻于东平郡（治所

①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秦泰山刻石”条，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泰山刻石”条，董道《广川书跋》卷四“秦泰山篆”条，陈思《宝刻丛编》卷二“秦泰山刻石并二世诏”条。

② 《宋史》卷三四〇《刘摯传》，跂为刘摯之子。

③ 宋·刘跂《泰山秦篆谱序》，载其《学易集》卷六，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121册。

④ 宋·董道《广川书跋》卷四“泰山篆”条，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3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一版。

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之四十八字本,又如江邻几做奉符(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知县时,患四方求者日至而重刻于县廨者,均为二世诏书^①。当时常见的拓本,也以五十字左右的二世诏书为多。

金元时期及明代前期,《泰山刻石》仍在岳顶原处^②。至明嘉靖年间,刻石已被移至岳顶元君祠西之玉女池侧。时人王世贞有《游太山记》曰:

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祠宇颇瑰伟……其右为御史所栖。后一石,三尺许,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纵广及深俱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③。

元君祠即今碧霞祠,距始皇封禅坛刻石原址一百多米。其后金石家每言《泰山刻石》“原在岳顶玉女池”,即是指此。既然石仅“三尺许”,则置于玉女池者已是残石。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和十七年(1589年),吴同春两次游泰山,有两篇游记,其《游泰山记》称:“署后观玉女池,与贾守共摩秦篆碑读焉。碑嵌岩中,止存三十字。”其《续游泰山记》对残石当时的状况记述颇详:

复读秦篆碑,与刘跂所记稍不吻合。若三面嵌壁,不能尽辨。令数力士出诸壁,乃知仅存刘所云之半。刘谓正面七行,今只存右畔三行,而其三面欲就岩安置,各加凿削,俱非当时之旧矣。涤洗拓摩,字形隐隐莫辨,第得石之真面目,与无字碑莹泽无异。……已,令数力士复嵌于壁,恐数千年物又损坏自今也。^④

据吴同春所记,残石是嵌置于岩壁间的,只存三行三十字。他命“数力士出诸壁”,以察看其他三面,方知当时为了“就岩安置”,其它三面已经“各加凿削”,不是原来面目了。

后来,残石又被移至碧霞元君祠之东庑,具体时间不详。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之人,



图1-1 泰安岱庙中《泰山刻石》残石现状

① 这两件重刻本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董道《广川书跋》均述及。

② 金·元好问《东游略记》,载其《遗山集》卷三四,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191册。

③ 明·王世贞《游太山记》,载其《弇州四部稿》卷七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280册。

④ 转引自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志》卷十三《艺文志·金石二上》“泰山刻石残字”条。

他著录《泰山刻石》已云：“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二十九字，在岳顶碧霞元君宫之东庑。”^①那么这次迁置至晚在明末。钱大昕则提到这次迁置的当事人：“世所传者仅二十有九字，明北平许某于岱顶榛莽中得之，陷置碧霞元君东庑壁，此真秦刻也。”^②所谓北平即北平府，明洪武初改大都路置，永乐初又改称顺天府，即今北京。此许某是把残石由玉女池旁，移置于碧霞元君祠室内。

《泰山刻石》残石移置碧霞祠后，其流迁经过就比较清楚了。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遭火灾，残石遂不知下落。嘉庆二十年(1815)，前泰安县令蒋因培于玉女池觅得残石二块，尚存10字，即嵌于山顶东岳庙西新筑之室(称“宝斯亭”、“读碑亭”)。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西墙壁坍塌，覆其室，泰安知县徐宗干复出残石于瓦砾间，命道人刘传叶将残石移至山下，嵌于岱庙西道院壁间。宣统二年(1910年)，新任泰安知县俞庆澜，商于提学罗正均，又将残石移置岱庙，于环咏亭前凿石为屋，周以铁楹，嵌石于其中。徐宗干、俞庆澜二位县令，均附刻《跋语》记残石迁变经过。另外，前引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亦记之颇详。民国时期1928年，残石又被移至岱庙东御座院内。今天，残石仍存岱庙，筑亭保护，仅存9字(图1-1，图1-2)。



图1-2 秦《泰山刻石》残石(拓本)

《泰山刻石》传世拓本不少，多为二十九字本和十字本。早期拓本最著名者，是北宋一百六十五字本和五十三字本，这两件拓本均为明代人安国旧藏，1940年被日人中村不折购去，现藏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2006年3月，其中一百六十五字本

①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泰山刻石”条。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二版。

②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一“泰山刻石”条。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二版。

(图 1-3), 与现已流落日本的诸多中国古代著名法帖一起, 曾在上海博物馆参加“中日书法珍品展”^①。



图 1-3 《泰山刻石》一百六十五字本(拓本, 册页, 现藏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2. 《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也是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时所刻, 原在山东诸城县古琅琊台遗址。秦始皇当年“南登琅邪, 大乐之, 留三月。……作琅邪台, 立石刻, 颂秦德, 明得意”。在驻留琅琊期间, “齐人徐市等上书, 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而秦始皇抱着莫大希望, “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 去寻找“不死之药”^②, 正是由这里出发的。

《琅琊台刻石》至北宋时, 文字已剥落。赵明诚《金石录》记《琅琊台刻石》当时的状况: “其颂诗亡矣, 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 然亦残缺。”^③

关于《琅琊台刻石》及其所在的琅琊台,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毕沅、阮元合撰的《山左金石志》记述最为详尽具体:

琅琊台在诸城县治东南百六十里。台三成, 成高三丈许。最上正平, 周三百步有奇。东、南、西三面环海, 迤北为登台沙道。台上旧有海神祠、礼日亭, 皆倾圮。祠垣内西南隅, 秦碑在焉。……以工部营造尺计之, 石高丈五尺, 下宽六尺, 中宽五尺, 上半宽三尺, 顶宽二尺三寸, 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之

① 东京国立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朝日新闻社《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2006年。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③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琅琊台刻石”条。

秦始皇颂诗及从臣姓名久剥去，今所存者，二世从官名及诏书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径二寸。^①

由此可知，《琅琊台刻石》为高一丈五尺、下宽上窄、厚度大致相同的长方形竖石，面南而立，亦应是四面刻字，当时仅西面有字，其余三面文字已剥落。残存文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姓名，计13行86字(图1-4)。



图1-4 《琅琊台刻石》残石拓本

宣统本《山东通志》述及当年刻石的保护状况：

碑中裂寸许，经前知县秦州宫懋让镕铁束之，得以不颓。后仁寿毛澄知诸城县事，筑亭覆之，笃古之士所以保持爱护之者备至。距今十余年前劫于雷火，数千载之巨碣，一旦震为齑粉，殊为深惜。近闻片石残字或有存者，然皆湮没散佚，不可复收。不知滨海好古家犹能出而搜剔残废，俾略存片段如泰山刻石之十字否也？^②

文中提到的前知县宫懋让，其任诸城知县在乾隆中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所刊《诸城县志》，即他在任上所修。所谓“镕铁束之”，应是以铁箍束石，防其继续开裂。前引《山左金石志》也提及宫懋让镕铁束碑之事。而毛澄任诸城知县，已到了光绪年间，其字蜀云，又字叔云，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六年(1900年)、二十八年(1902年)三次出任泰安知县，对保护泰山文化卓有贡献，他任职诸城期

① 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七“琅琊台石刻”条，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9册。

② 宣统本《山东通志》卷一五一《艺文志第十·金石》“秦琅琊台刻石”条，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2册(以《山东金石志》为名)。

间，又有筑亭保护《琅琊刻石》之举。至于刻石“劫于雷火”，相传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不过后果没有“震为齏粉”那么严重，也并非“湮没散佚，不可复收”。大概，雷火焚毁的是毛澄所筑之碑亭，刻石虽迸裂而残石犹存。

历史进入民国后的1921年，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派县视学王培祐两次前往琅琊台搜寻刻石遗迹，果然在荆棘草莽中找到有字残石。残石运回城中，拼接粘合，嵌于县教育局，得13行79字，仅就文字而言，损失并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琅琊台刻石》残石移藏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又被运至北京，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3. 其他已佚刻石

《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是秦刻石中最幸运的，虽然仅存残石，但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原物，而其他五种刻石，早已不知所终，连一片残石也没留下来。

《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原立于之罘山，即今山东烟台市的芝罘岛。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即登之罘山，但未立石；第二年再度东巡，又登之罘，立《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最后一次南巡会稽，北返时他又至之罘，还在这里“见巨鱼，射杀一鱼”。^①秦始皇三登之罘，刻石两块，可见对之罘的重视。北宋时，之罘山上还有残存的断石，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都提到之罘山有二十余字的秦篆遗文^②，也不知属两件刻石中的哪一件。此后就不再为人提及，踪迹全无。

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时，“之碣石……刻碣石门”^③，此即《碣石刻石》。不过此刻石从未见于金石著录，就连“碣石”这一地方的具体位置，也有多种说法。有说在今河北乐亭县的，有说在今河北昌黎县的，也有说在今辽宁绥中县的。所在何处尚且定不下来，刻石本身更是无迹可寻。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南至钱唐（今杭州），“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④。此“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之会稽山，山上有大禹陵；所立石刻即《会稽刻石》。郦道元《水经注》云：“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存山侧。”^⑤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⑥可知北魏、唐代，《会稽刻石》还立于山上。然而，宋代的金石著作却不见著录，很可能至宋代《会稽刻石》已经不存在了。到了元代，绍兴学宫曾翻刻长安本《峰山刻石》，在其碑阴也依据旧拓摹刻《会稽刻石》。清康熙年间碑阴所刻被人磨去，另刻别文。至乾隆年间，绍兴知府又磨去后刻之字，以元代摹刻之拓本再度摹刻于原石之上，这就是现存的翻刻本《会稽刻石》。

关于《峰山刻石》，后文会专门述及。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②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之罘秦篆遗文”条；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琅琊台刻石”条。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⑤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四〇“浙江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53页。

⑥ 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所引。

三、李斯、小篆与“书同文字”

说到秦始皇及其兼并六国的功业，说到秦代刻石和秦代“书同文字”的重大变革，有一个人是无法忽略的，他就是李斯。李斯作为辅佐秦始皇成就统一大业的重臣，每次出巡都跟随左右。相传所有刻石都是由他撰写文辞，并由他以小篆书体写就。小篆书体是秦始皇为统一文字向全国推行的标准字体。在其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中，统一文字应该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而李斯正是秦代文字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出身低微。他年轻时在地方上做小吏，看见吏舍厕所中鼠食不洁，人犬近之，惊恐不安，而仓中之鼠，吃的是上好粮食，住的是大屋，又无人犬惊扰，不由感慨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①后来那位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陈涉，也曾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②两者何其相似。

不安于自身卑贱地位的李斯，后来师从荀况学习帝王之道。学成后，他审度天下大势，认为楚等关东六国均已衰落，“无可为建功者”，只有西方的秦国正雄心勃勃，欲并天下，“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西入秦国。起初，他投于吕不韦门下当舍人，颇得赏识，使他有机会见到刚刚即位的秦王嬴政。他向未来的始皇帝陈说兼并六国之策，得到信任，拜为客卿。之后，随着秦国兼并战争的逐步胜利，随着统一后庞大帝国的建设，李斯这个昔日的“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地位也越来越高，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可谓富贵极矣”^③。

秦帝国不仅在政治领域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④，以改变“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⑤的局面。秦统一前，中国古代文字已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道路。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石鼓文(籀文)，汉字这一象形文字体系一脉相承，走向成熟。此时，汉字中主要的偏旁部首已基本定型，这些根据事物分类意义而确定的抽象的义符，与依类摹声或约定俗成的表达事物特性的独体字(声符)，在不同层次和方向上相互结合，使文字的表意功能增强，造字范围迅速扩大，而且汉字书体也渐趋规范严整。这一切为秦小篆的产生乃至“书同文字”准备了条件。

战国晚期各国的文字，大致可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西方的秦国通行籀文大篆，后来又在大篆基础上由繁到简，形成了小篆。而在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一带，则通行“古文”。东西两个系统的文字均源于西周金文，只是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局面自然无法适应统一的历史大趋势，于是，胜利者的文字便成了改变这种局面，进行文

①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②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③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⑤ 语出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7页。

字改革的基础。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当时已经流行于秦国的小篆书体，进一步加以省改和规范化，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向全国推广，同时废除与小篆异体的六国文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文字改革。

就在秦朝政府自上而下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的同时，在民间，还有一股自发的改革潮流，其结果就是隶书的产生和普及。相传隶书是一个叫程邈的人创造的，他是下邳（今陕西渭南之北）人，当过狱吏，后因触犯法律，坐牢十年。就在这十年间，他在牢中把官方文字小篆删繁就简，化圆为方，形成“隶书三千字”，上奏秦始皇，得到起用。此说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其实，趋用于秦，定型并大盛于两汉的隶书，其生命之树早在战国时期便已萌芽、破土了。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千多枚从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竹简，均用隶书写成^①。这种隶书虽然还有篆书的痕迹，但总体来看已脱出篆书的规范，具有了自己的面貌。如果再向前追溯，春秋时期侯马盟书那书于玉石片上的不拘一格的毛笔朱书，已透出隶书最早的信息了。从出土的实物资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钟鼎文这种镌铸于青铜器皿上的官方正统书体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随意多变的毛笔手写体存在。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文字的普及，这种书体与镌刻书体平行发展。从楚国缙书，战国青川秦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可以大致看出其发展轨迹。至秦统一前后，这种日趋简化的手写体更加普及，进而演变成隶书，便顺理成章了。当时，高文册典用小篆，如各处秦刻石、秦始皇及秦二世的诏版等，日常书写则用隶书。由于隶书较小篆更为简化，所以普及更快，生命力更强，对后来中国文字、书法的影响更大。

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汉字体系，是世界古老文字中惟一沿用至今的。它所以能比苏美尔文、古埃及文、古巴比伦文更为幸运，不仅在于这种表意兼表音的词素文字，能够适应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发展，还在于当年这场“书同文字”的改革。它对汉字的发展，对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的形成，乃至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怎样估价也不过分。古代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分裂、外族入侵，之所以没有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那样，形成文化上和政治上相互独立的一个个邦国，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文字的统一实在是一个重大因素。汉字体系不仅适应着汉语语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也适应着中国各地语音歧异的方言，甚至还能被不同语种的民族如日本、朝鲜所借用。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种巨大的向心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改革家，个人的结局都不好，李斯也不例外。而且，他身后的名声尤为不佳，在后世儒者眼里，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等诸多暴政，都与他脱不了干系。加之其人品上的污点，更留下后人诟病的口实。然而，不管后人诅咒也好，颂赞也好，嬴政、李斯这一代豪杰，在秦王朝建立后短短十余年间的所做的一切，毕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把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国模式，把一个以郡县制和封建官僚制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把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的文字，留给了中国，并影响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秦始皇君臣当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们是把

^① 《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成功实践，推向全国。他们所要变革的，是商周以来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他们面对的，是失去了既得利益的六国宗法贵族集团的拼死反抗。虽然他们的秦王朝昙花一现，在专制暴政激起的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很快土崩瓦解，但是，就像一个人生命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寿命长短一样，秦王朝短暂的历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而嬴政、李斯们对传统的反叛精神，积极有为的历史主动性，也是此后任何王朝的明君贤相都无法相比的。

诚然，肇始于秦始皇的这一套基于法家思想的极权专制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经汉代与儒家思想的交融合流，形成了中国两千年来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基础，而近代以来，当中国又一次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却以其巨大的惯性，成为历史前进的顽强的阻力。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痛切地感到这笔遗产的沉重。但我们不能因此去指责秦始皇和他当年的改革，两千年前的改革者，不应该为两千年后的停滞、僵化和腐朽负责。

四、碑林现藏宋刻秦《峰山刻石》

《峰山刻石》是秦始皇首次东巡郡县，上邹峰山时所刻，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峰山上的原石早已毁佚（图1-5，图1-6）。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言及《峰山刻石》时说：

始皇刻石纪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上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间有绎山碑，皆新刻之碑也。^①

曹操是否干过此事，于史无考，但他确曾有过立法，针对东汉之积弊，以妄媚死者，增长虚伪、浪费资材为由，“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②民间将《峰山刻石》之毁归咎于他，不是没有道理，但疲于供命的邑人将刻石焚毁，更为可信。杜甫就有“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③的诗句，说的正是此事。封演、杜甫两位唐人的诗文还告诉我们，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曾有《峰山刻石》的重刻本和枣木刻本流传。

宋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有两则与《峰山刻石》有关的跋，一则说的是碑林现藏郑文宝重刻者，另一则说的应是《峰山刻石》之残石：

右邹峰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较之，字之存者颇多而磨灭尤甚。其赵婴、杨穆姓名，以史记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穆。皇帝曰：金

①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绎山”条，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826册。

② 《宋书》卷十五《礼志二》。

③ 诗句出自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图1-5 今日峰山

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于泰山存者。^①

欧阳修是依据拓本著录，也许，北宋时峰山上仍有毁余之残石存在，也许当时残石已经不存，欧阳修见到的只是前人传下来的拓本。与此类似的还有董道《广川书跋》所记：“陈伯修示余峰山铭，已残缺，其可识者寥寥耳。视其气质浑重，全有三代遗像。”^②他见到的也是残石拓本。看来，北宋时起码还有《峰山刻石》残石拓本存世。可惜的是，残石没有留下来，残石拓本也没有流传下来。

西安碑林藏宋刻秦《峰山刻石》，是北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依据徐铉摹本，重刻于京兆孔庙的。重刻本为长方形竖石，高218厘米，宽84厘米。两面刻字，正面9行，背面6行，每行均为15字。秦始皇刻辞四字一句，三句一韵，共144字。从背面第一行“皇帝曰”起，是秦二世诏文，共79字，字体略小(图1-7，图1-8)。秦二世诏文之后，刻有郑文宝题记，共5行，行40字，楷书，其文曰：

秦相李斯书峰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绎山碑模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已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竖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绎山求访秦碑，邈然无睹，逮于旬浹，怊怅于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模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记度转运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

①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邹峰山刻石”条。

② 宋·董道《广川书跋》卷四“峰山铭”条。

郑文宝重刻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书法欣赏，是不忍见李斯小篆之“神踪将坠于世”。郑文宝(953 - 1013)，字仲贤，一字仲玉，宁化(今福建宁化)人。其父事南唐，他则以荫授奉礼郎、校书郎。入宋后登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官至河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①。淳化四年重刻《峰山刻石》时，他在陕西转运副使任上。

郑文宝所依据的底本，是“徐所授模本”。此徐即徐铉((917 - 992)，字鼎臣，扬州广陵人，仕于南唐，官至御史大夫。后随李煜降宋，为率更令。其敏于文辞，尤精小学，工于小篆、八分，以文翰知名于江南。淳化二年(991年)，晚年的徐铉受诬而“贬静难行军司马”。静难即静难军，治所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因“邠州苦寒”而“致冷疾”，徐铉即卒于此，终年七十六岁。“铉无子，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②看来，徐铉与弟子郑文宝的关系如同父子，因以“绎山碑模本”相授。他去世后，正在京兆任职的郑文宝为其护丧至汴。而郑文宝将老师珍爱的“绎山碑模本”，特意“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立于《开成石经》及唐代书法名碑之侧，则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郑文宝在题记中提到，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他举进士不中，曾“东适齐鲁，客邹邑，登绎山求访秦碑，邈然无睹”，竟然“逮于旬浹”即滞留了十天才怅然离去。可见至北宋前期，峰山上已无秦刻残石踪迹。那么，徐铉所获“绎山碑模本”可靠性如何呢？考虑到《峰山刻石》的文词《史记》不载，而郑文宝重刻本的文字完整无缺，且“其文词简古，非秦人不能为也”^③，则徐铉“模本”不可能凭空臆造。它或者拓自封演所说某县宰取旧文勒于县廨的那件唐代重刻本，或者是杜甫所说的枣木传刻本，或者是依据旧拓辗转临摹的摹本，应该是有来历的，只是现在已无法说得清楚而已。

自郑文宝重刻《峰山刻石》于长安后，各地据此翻刻者颇多。明人都穆《金薤琳琅》共列举了7种，即长安本、绍兴本、浦江本、应天府学本、青社本、蜀中本、邹县本，以长安本为第一^④。钱大昕亦云：“传刻有数种，以西安儒学郑文宝所摹者为佳。”^⑤至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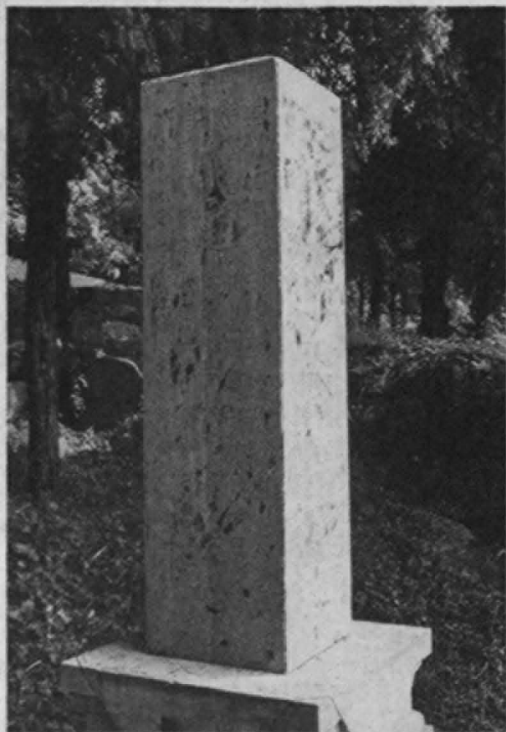


图1-6 今人在《峰山刻石》旧址立纪念碑并据“长安本”重刻碑文

① 《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

② 《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

③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三“秦峰山刻石”条。

④ 明·都穆《金薤琳琅》卷二“秦峰山刻石”条。

⑤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一“峰山刻石”条。

略邪山樂戶以普經紀皇帝曰金石
 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亦
 不稱始皇帝其心之遠也如後嗣為
 者不稱成功成德亦相臣斯臣亦秩
 事亦臣德味所喜臣請具劾詔書金
 石亦臣請具劾詔書金石

秦相李斯書繹山碑跡妙時古為世重故散騎
 山碑據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
 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不中東道齊魯客
 兼之下惜其神駿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模本于
 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 守太常博士陳府西

徐公第酷耽書著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
 已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
 登繹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建於旬決招恨于
 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
 遂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图1-8 宋刻《峰
 山刻石》(拓本,
 碑明)

皇帝立國維初杜善無世稱王許伐亂
 詳威動四極去義直方我臣奉詔經時
 不欠滅火暴強廿武火季上蕭高號貴
 蹈顯即既獻齋成方降專專廟軌遠方
 登于繹山羣臣歸省咸思攸焉追命亂
 世分土畫邦以屏義理功戰曰作流正
 於睦自齋古始世臻象鬱既乃又帝莫
 能禁也適今皇帝壹家不下兵不復起
 熹周滅餘新自肅定和澤安只羣臣誦

图 1-7
 宋刻《峰山
 刻石》(拓
 本, 正面)